

讖纬与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

孙蓉蓉

提 要 兴盛于我国汉魏六朝的讖纬同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讖纬的神学迷信、荒诞诡异,以及其“事丰辞富”的特点,为志怪小说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因此,志怪小说中有表现讖纬的内容,如圣人感生、灾异遣告等,而志怪小说在“志怪”艺术上,也注重想象丰富、辞采华茂。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 讖纬 汉魏六朝 志怪小说

讖纬是兴盛于我国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以“阴阳五行”为核心、宣扬“天人感应”的学术思潮,它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也与讖纬的兴盛和流行密切相关。讖纬的神学迷信、荒诞诡异,以及其“事丰辞富”的特点,为志怪小说的繁盛创造了条件。然而,现在学界在研究这一时期志怪小说时,注意到道教的神仙方术和佛教的报应轮回等的影响,^①而忽略了讖纬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欲从志怪小说中的讖纬内容、讖纬的“事丰辞富”与志怪小说的“志怪”艺术等方面,来探讨讖纬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关系问题。

一 志怪小说中的讖纬内容

汉魏六朝讖纬之说的兴起和盛行,以致灾异神怪之事泛滥成灾,这为小说的“志怪”提供了极佳的空间,为志怪小说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因素,如道教和佛教的影响等,但是讖纬的兴盛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内容丰富多样,其中有关讖纬的内容,是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志怪小说中的讖纬内容,涉及到对讖语、谣讖的记载、圣人感生的描述、符瑞灾异的叙写,以及阴阳五行的载录等。讖纬的相关内容,在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志怪小说中的讖纬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讖语、谣讖的扩展记载。讖是一种诡秘的隐语,古代被认为是显示神的预言,能够预测未来后事。谣讖则是以童谣、谣谚形式出现的一种讖语,用来预测历史、政治的事件和人物等,讖语和谣讖都是我国古代讖纬的组成部分。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讖纬与文学研究”(批准号 08BZW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阅王连儒:《志怪小说与人文宗教》,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有谶语、谣讖的记载和描写。如干宝《搜神记》第七十七条《华山使》: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容从关东来,将入函关。西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问郑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使也。愿托一牋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

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树,果有人来取书。明年,祖龙死。^①

《搜神记》的这则故事源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本事记载极其简略,如“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②《搜神记》的描写不同于史书的记载,因为它已经具有了小说的因素,有一定的情节,还出现了人物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人一神,人与神形象各异。华山使者托于郑容的牋书即是讖书,书中“明年,祖龙死”是讖语,“祖龙”指秦始皇。《搜神记》的这一记载反映出普通百姓对暴君的诅咒,而这样的记载又增强了讖语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从而使我国古代的讖语、谣讖在社会上更加流行,而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或欣赏。又如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也记载有讖语的应验,曰:

明帝初,有谣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硕,峻弟也。后诸公诛峻,硕犹据石头,溃散而逃,追斩之。^③

在荀氏的《灵鬼志》中共有四则“谣征”,都是记录谣讖预言了后来事情的发展。本则所记谣讖,是晋明帝司马绍之子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后所验证之事。成帝咸和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谋反,第二年占领京城建康(今南京),把成帝等人羁押在石头城。之后,晋将陶侃、温峤、虞亮等人讨伐苏峻,并诛杀之,其弟苏硕亦被斩于军中。“高山崩,石自破”,就是指苏峻死后,苏硕也相继被杀。与《灵鬼志》的解释略有不同,《晋书·成帝纪》以为苏硕为苏峻之子,而非其之弟。^④《灵鬼志》中对“谣征”的记载都很简略,没有故事情节的展开,作者力图对于谣讖的预言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以此说明讖语、谣讖的神秘性。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中有很多讖语、谣讖证验的故事,它们往往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因而这一类的记载和描写表面虽极为诡异荒诞,但其实质具有极强的历史感和真实性。有的讖语记载还体现出民意民情,如志怪小说有不少关于秦始皇的讖语,^⑤就能说明这一点。

第二,圣人感生的描述。讖纬认为古代帝王、圣贤非凡夫俗子,而是感天而生,其母都

①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页。

③ 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11页。

④ 房玄龄:《晋书》卷7《成帝纪》:“四年春正月,帝在石头,贼将匡术以苑城归顺,百官赴焉。……峻子硕攻台城,又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城中大饥,米斗万钱。”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174页。

⑤ 如刘敬叔《异苑》卷4:“秦世有谣曰:‘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睡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圻既启,于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冢壁,政甚恶之,乃远沙丘而循别路,见一群小儿犂沙为阜,问,云:‘沙丘。’从此得病。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页。又如,任昉《述异记》卷下:“始皇二十六年,童谣云:‘阿房阿房,亡始皇。’”见《四库全书》子部12,小说家3。

是或大人迹、大迹,或大霓、流星,或赤龙、赤鸟等感附而生,纬书中多有这样的记载。如《春秋·元命包》对神农的描写:“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①纬书中的这些记载影响了志怪小说,因此当涉及帝王、圣贤时志怪小说作者所描写的就是圣人感生。如《汉武故事》中王皇后梦日入怀生武帝,曰:

汉景帝王皇后内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入其怀。帝又梦高祖谓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 ..^②

《汉武故事》属杂史体志怪小说,故事中王皇后“梦日入其怀”而生汉武帝,这种圣人感生的描写正与讖纬所宣扬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相吻合。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评《汉武故事》:“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③所谓“妖妄之语”就是指那些不合史传的虚构荒诞的记载。此外,王嘉《拾遗记》中亦有很多关于圣人感生的记载,如卷一《春皇庖牺》:

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时。且闻圣人皆有祥瑞。^④

又如《拾遗记》卷二《殷汤》:

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紱。夜梦神母谓之曰:“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狄乃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月而生契。^⑤

从庖牺到殷契,其母都是感附而生。王嘉《拾遗记》所记上自庖牺下迄石赵,历述各代逸事,其中涉及帝王、圣贤的出生,基本上都是采用了圣人感生的说法。关于“圣人感生”之说,当然荒谬虚妄,正如《论衡·奇怪篇》所曰:“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复姓曰姒。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其言神验,文又明著,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⑥王充在此之论,就是针对讖纬的“天人感应”、“圣人感生”而发的,因此志怪小说中对于帝王、圣贤的感生描写不免虚无荒诞。然而,正是志怪小说的这些描写,把历史与神话、真实与虚幻巧妙融合,由此发展了志怪小说的艺术表现。

第三,符瑞祥兆的叙写。讖纬学说基于“天人感应”的理论和观念,又有祥瑞灾异之

①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9页。

② 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51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2子部小说家类三异闻,《四部精要》(10)史部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78页。

④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⑤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2,第40页。

⑥ 王充:《论衡》卷3《奇怪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说,认为“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①天要显示其对人世支配和控制的作用,必然要借助于某种事物来显现。如《尚书大传》载“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②这就被认为是一种祥瑞之兆,它预示着周代将要兴旺强盛。因此,纬书中有很多符瑞祥兆的记载,如“白鱼”、“赤乌”、“黄银”、“紫玉”等,都是帝王即位的瑞兆,或是仁政德至的象征。受此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中,也有不少符瑞祥兆的描写。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唐尧”:

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来服,分职设官,彝伦攸叙。乃命大禹,疏川渚泽。有吴之乡,有北之地,无有妖灾。沉翔之类,自相驯扰。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之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青鸛,其声似磬笙竽也。《世说》曰:“青鸛鸣,时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鸣薮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像其形,铭赞至今不绝。^③

唐尧时期的圣德仁治、太平盛世,因而处处显现出吉祥瑞兆。《拾遗记》中这一类的描写很多,因此萧绮《序》评《拾遗记》为“多涉祲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④又如《搜神记》第一二七条《泰山石立》: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芜莱山南,洶洶有数千人声。民往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集其旁。宣帝中兴之瑞也。^⑤

泰山大石的自立,又被认为是“中兴之瑞”。志怪小说中这些符瑞祥兆的描写和记叙,都说明这些事物的出现代表着天意,如“翔鸣薮泽”、“大石自立”等是纯粹的“受命之符”,而绝非人力所能招致。因此,志怪小说中对符瑞祥兆的描写同讖纬之说是相一致的。

第四,灾异遣告的记录。关于灾异遣告是讖纬又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同符瑞祥兆一样,它也是显示天意的一种途径和手段。讖纬认为灾异的缘起,在于“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⑥灾异缘起于政治的衰败,而灾异遣告的作用,“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懼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⑦。其作用在于天通过自然灾害或以自然物的变异,来警告人世的统治者,及时调整政策措施,否则将酿成亡国害民大祸。纬书中有很多关于灾异祸害的记载,如日蚀、大雾、流星、雷暴等,以此预示国家兴亡和政治得失。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3《同类相动》,《四部精要》(12)子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16页。

② 伏胜撰、郑玄注:《尚书大传》卷3《周传》,《四部丛刊》初编经部,第9册。

③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④ 萧绮:《拾遗记序》,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第1页。

⑤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6,第75—76页。

⑥ 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00页。

⑦ 班固:《汉书》卷56,第2498页。

而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也有大量的灾异遣告内容,其中尤以《搜神记》最为典型,干宝有意识记录此类故事,以对谶纬中的灾异遣告之说作出具体说明和发挥。如《搜神记》第一四七条《儿生两头》:

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有女子生儿,两头两颈,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回:“‘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政将变更。厥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两颈,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媒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①

干宝在这里所记,无非是一两头两颈的连体婴儿,这种人体变异的现象,使得谶纬将其同政治、人事联系起来,所谓“政将变更”、“以谴失正”、“所任邪也”和“下不胜任”等等。又如《搜神记》第一四五条《男子化女》: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曰:“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故后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②

这一条的记载将一男子的变性生子,同“一世乃绝”联系起来,并进而指出王莽的篡权夺位。在《搜神记》中将西汉末成帝、哀帝和平帝时期的怪异现象,如“木生人状”、“马出角”、“人死复生”等,都直接同王莽篡位联系起来。《搜神记》卷六至卷十基本都是记录了怪异和灾害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干宝运用了京房的《易传》理论来加以阐释。

京房是汉代著名的易学家,他将董仲舒的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和《易经》学说相杂糅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重要学说。《搜神记》中记录灾异现象并应用京房《易传》理论加以解释的多达二十九条,这些记录是“性好阴阳术数”的干宝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③,但在客观上有劝诫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第五,阴阳五行的叙录。战国阴阳家驺衍把古代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又糅合了方术迷信,构造了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到汉代经董仲舒等人的大力发展,从而形成以阴阳五行为核心,把自然和社会、历史和地理、科学和神学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谶纬以五行学说来预言王朝的兴替,如《吕氏春秋·有始览·名类篇》:“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降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④这一记载说明,王朝的更替都是天意的体现,所以每一个王朝兴起,天神都要降临瑞祥。王朝的更替是按照土、木、金、火、水的

①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6,第82页。

②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6,第81页。

③ 干宝:《搜神记序》,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2页。

④ 吕不韦撰、高诱注:《吕氏春秋》卷13《有始览》《名类篇》,《四部丛刊》初编子部,第72册。

顺序循环,周而复始,故称“五德终始”说。这一内容在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中也有记载,如王嘉《拾遗记》卷七魏:

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鄆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灵芸年至十五,容貌绝世,邻中少年夜来窃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264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乃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歔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旁,一里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栖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七字是妖辞也。为铜表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置台下,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土上出金,是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改灵芸之名曰夜来,入宫后居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胜,况乎龙鸾之重!”乃止不进。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帏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①

这一则说的是曹丕妃嫔薛灵芸的故事,但其中却包含有“阴阳五行”说。如文中的“土上出金火照台”一句被称为“妖辞”,即是指邹衍用五行相生相克之术,来解释历代帝王禅替的气数,因此下文的“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土上出金,是魏灭而晋兴”就是由邹衍的五行之说推演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萧绮录曰:“五常之运,迭相生死,起伏因循,显于言端。童谣信于春秋,讖辞烦于汉末,或著明先典,或托见图记。金详《河》、《洛》,应运不同。唐尧以炎正禅虞,大汉以火德授魏,世历沿袭,得其宜矣。”^②萧绮的叙录正指出了古代帝王、朝代嬗变更替的五行相胜、相生的特点。《拾遗记》中薛灵芸故事本身无关乎讖纬,但描写到她来京途中听到“行者歌曰”,却自然地引出了有关讖纬的内容。

由上可见,志怪小说中的讖纬内容是多方面的,从描写讖语、谣讖,到记录祥瑞灾异,讖纬的学说理论在志怪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展示和描述,可以说这一时期作为思想学术的讖纬,在文学领域的小说中得到了阐释和发挥。

二 讖纬的“事丰辞富”与志怪小说的“志怪”艺术

讖纬的内容虚伪诡异、荒诞不经,但是其叙事记物却具有文学性,《文心雕龙·正纬》篇将它概括为“事丰奇伟,辞富膏腴”^③。讖纬的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志怪小说的创作,想象丰富、题材多样、描写细腻和词采华茂,从而形成了志怪小说的“志怪”艺术。

为“配经”而形成的讖纬,作为经学的一个部分,虽内容虚伪诡异,充满神学迷信色彩,但它的叙事记物却具有一定文学性。首先,这种文学性表现在它所记叙的事物奇异丰富,充

①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7“魏”,第159—160页。

②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7“魏”,第161页。

③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满想象,具有文学色彩。为宣扬天命王道、君权神授和符瑞验应等,谶纬中记载有大量关于伏羲、神农、轩辕和少皞等传说故事。如《尚书·中候》:“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又龟书,洛出之也。”^①《春秋·元命包》:“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穡般戏之事。”^②纬书中的这些描写都是为宣扬“天人感应”而作,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们实际上就是一种神话故事。作者充分运用想象,将神话故事与我国上古历史糅和起来,把上古时期传说中的帝王描绘成他们理想中的人物。而且,纬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也不限于古代帝王、圣贤,如有描写西王母的,有讲述大人国的等等,从而形成了一个丰富多采的故事宝库。此外,纬书中对天文历法的解说和山河地理的描述,同样也形象生动。如《尚书·考灵曜》:“天地开辟,元历纪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初,日月若悬壁,五星若编珠。”^③在开天辟地后的自然天象中,作者把“日月”、“五星”形容为“悬壁”、“编珠”,华丽多采,形象生动。谶纬的取材丰富广泛,描写雄伟奇特,它们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也为文学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其次,谶纬在叙事记物时其用词造句也具有文学语言的特点。纬书作者记述祥瑞符应,用词繁富华丽,色彩鲜艳多姿,极尽铺陈罗列之能事,似有汉赋的语言特色。如《孝经·援神契》:“德至深泉,则黄龙见,醴泉涌,河出图,洛出书”;“德至鸟兽,则凤皇翔”;“德至鸟兽,则鸾鸟舞”;“德至鸟兽,则麒麟臻”;“德至鸟兽,则白虎见”。^④又如《礼·斗威仪》:“君乘金而王,则紫玉见于深山”;“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则黄金见于深山”;“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则海出明珠”。^⑤这里的“黄龙”、“泉涌”、“凤凰”、“鸾鸟”、“麒麟”、“紫玉”、“黄金”等,都是帝王即位的瑞兆,或是仁政德至的象征。这一连串的词语,都运用了人们喜爱或向往的自然界美好的景物或珍宝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谶纬的文学特点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中得到了概括和肯定。《文心雕龙·正纬》篇是刘勰为批判谶纬的“乖道谬典”、“无益经典”而作的,然而,在这过程中刘勰又慧眼独识,指出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正纬》篇:“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⑥刘勰认为,谶纬之所以“有助文章”,就在于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即谶纬所叙述、记载的事物奇异丰富,而其语言又繁富形象。文学家们可以从谶纬中摭取丰富奇特的“事”与绚丽生动的“辞”,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而这正是谶纬的“有助文章”。并且,刘勰进一步指出“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谶纬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以至后来的文学家在创作时汲取谶纬的“英华”。它不仅表现在当时诗、赋、文等作品,而且还体现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

谶纬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对于志怪小说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志怪小说的题材多样丰富,想象奇异独特。如汉魏六朝的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就是受谶纬影响而产生的一

①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399页。

②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589页。

③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343页。

④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977—978页。

⑤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522页。

⑥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29页。

种新题材的小说。纬书中如《河图括地象》、《河图玉版》等这些书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关地理博物内容。后来文人对这些内容加以敷衍加工,出现了诸如《括地图》、《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等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其中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最为著名。《晋书》张华本传称其博学嗜书,“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①其中张华特别精于“图纬方伎之书”,“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贍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②此外,王嘉《拾遗记》中亦记张华好观图纬,曰:“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摭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即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③显然,张华撰《博物志》同其详览“图纬方伎之书”和“好观秘异图纬之部”莫不相关。《博物志》内容相当庞杂,有山川地理知识,有历史人物传说,有奇异的草木虫鱼,以及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伎故事的记载,其中还有不少古代神话的材料。如卷三“异兽”中蜀山猴獼:

蜀山南高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獼,一名马化,或曰獼獼。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不敢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獼獼、马化之子孙,时时相有獼爪者也。^④

这一则描述文字篇幅较长,有形象刻划,有细节描写,而且故事奇特怪异、委婉有趣,它首开同类题材小说的先河。后来的神异志怪小说,大多沿袭它的基本线索而加以增益衍化。如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宋元的《清平山堂话本》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明代瞿佑《剪灯新话》的《申阳洞记》,都是以此为题材而加工创作的。谶纬中丰富奇特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天文地理知识等为汉魏六朝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加工、演变的基础,故出现了像《博物志》等一类的受谶纬影响,又具有谶纬色彩的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

其次,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描写,其语言还具有词采华茂、辞富膏腴的特点。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宴戏,奏(女更)娟之乐,游漾忘归。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鸂置于表端,言鸂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迴薄化无方。浚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乐悦未央。”俗谓游乐之处为桑中也。《诗》中《卫风》云:“期我乎桑中。”盖此类也。白帝子答歌:“四维八埏眇

① 房玄龄:《晋书》卷36《张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4页。

② 房玄龄:《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68页。

③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9《晋时事》,第210—211页。

④ 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难极,驱光逐影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余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穷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金鸣于山,银涌于地,或如龟蛇之类,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龙凤状,有山盘纡亦如屈龙之势,故有龙山、龟山、风水之目也。

亦因以为姓,末代为龙丘氏,出班固《艺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异传》。^①

这一段关于皇娥与白帝子的故事,描写细腻、情致缠绵、词采艳丽,艺术性很高。而这些描写显然是在纬书如《春秋·元命包》等有关少昊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其用词、造句、文采等颇似纬书,很像是一部谶纬小说。事实上,《拾遗记》的作者王嘉谙熟谶纬,如《晋书》本传记载:王嘉“问其当世事者,皆随问面对。好为譬喻,状如戏调;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②从本传的记载来看,王嘉本人对谶纬相当精通,以至于当政者如前秦苻坚、后赵姚萇等都向王嘉卜问吉凶。所作《牵三歌谶》隋时已亡佚,但从书名看,是一部谣谶一类的书。由于王嘉深谙谶纬,这就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使其所著《拾遗记》成为一部具有谶纬特点的志怪小说。并且,王嘉的《拾遗记》文笔绮靡、用词绚丽,后人评语多有论及。如梁萧绮《拾遗记序》曰:“辞趣过诞,意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祲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③清代谭献《复堂日记》卷五:“《拾遗记》,艳异之祖,恢谲之尤,文富旨荒,不为典要。”^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拾遗记》为,“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⑤。在对王嘉《拾遗记》的评论中,《四库全书总目》则特别引用刘勰之语,曰:“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宴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忤绮录,亦附会其词,无所纠正。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⑥这些评论正指出以《拾遗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受谶纬的影响既表现为“多涉祲祥”、“诞谩无实”,内容上虚假诡异、荒诞不经,又说明其“艳异之祖”、“文笔颇靡丽”,而语言表达上则绮丽华茂、生动形象。《四库全书总目》以刘勰评谶纬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来评论《拾遗记》,似亦可说明两者的关系。

最后,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在叙事奇异、词采绮靡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篇幅较长,有情节对话,也有人物个性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紫玉》: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之外。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

①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1《少昊》,第12—14页。

② 房玄龄:《晋书》卷95《王嘉传》,第2496—2497页。

③ 萧绮:《拾遗记序》,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第1页。

④ 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明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6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2子部小说家类三异闻,《四部精要》(10)史部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78页。

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唏嘘流涕,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举,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时节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齎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①

人鬼相恋是我国古代小说一个重要题材,《搜神记》在《列异传》、《陆氏异林》等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又将其发展成为曲折优美的故事。关于紫玉的传说,最早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有记录,而干宝在《搜神记》中却将其敷衍成一个凄婉动人的鬼相恋的爱情故事。其中紫玉的形象鲜明生动,她为情而死、为情而冥会,也为情而救韩重,生死不渝,执著热情。而故事的描写则细腻曲折,曲尽人情,凄婉欲绝,已粗具唐传奇之风。干宝撰《搜神记》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也”^②,然而实际上像《紫玉》这一类人鬼相恋的故事,表面荒诞神异,但其背后却充满世俗性和人情味,从而使这一类故事在志怪小说中尤为出色出彩,佳作妙篇时有出现。

在谶纬“事丰辞富”影响下的志怪小说,其艺术表现尤为突出,在记录奇事异物上极尽想象敷衍、铺陈夸张之能事,而在语言的表达上,又显示出词采绮丽、形象生动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表现有了提高,并影响了后来志怪小说及其他题材小说的发展。

三 谶纬影响下的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我国唐前古小说中的一种,是古代小说的原始形态。而受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影响而大力发展起来的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小说”的认识、小说审美作用的理解,以及小说艺术价值的展示方面,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影响了人们对“小说”的认识,把小说与方术联系起来。对于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鲁迅曾评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③这一评论指出了汉魏神仙盛行、佛教流传是志怪小说产生的土

①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16《紫玉》,第200—201页。

② 干宝:《搜神记序》,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2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第24页。

壤和条件,其中还有讖纬兴起的重要因素。并且,讖纬也借助或融合了方伎数术来宣扬其“天人感应”论和“阴阳五行”说,因此讖纬与方术实为同一性质的神学迷信思想。讖纬、方术的流行,影响到小说的作者多为方士,如《汉书·艺文志》“小说”类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①他们既掌握神仙方伎,又精通图讖纬学,以至在志怪小说创作中也自神其教、大行其道。志怪小说中讖纬、方术的内容影响到这一时期人们把“小说”同“医巫厌祝之术”联系起来,如张衡《西京赋》:“匪唯玩好,乃有秘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②所谓“厌祝之术”,即为方术,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所指出的,“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③。关于小说与方术的关系,王瑶《小说与方术》一文认为:“无论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都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④小说与方术的这一结合,虽然看似迷信诡异,但却使志怪小说在原有《山海经》的基础上顺势而行,开辟了一个神奇幽秘、灵异怪迹的新境界,从而使得地理博物、神仙鬼灵的志怪小说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讖纬、方术等思想学说对志怪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发展,也使人们对小说的功用和意义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即“游心寓目”说。如《搜神记序》:“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⑤在干宝看来,志怪小说的创作,既非文以载道,亦非扬名垂世,而是“游心寓目”,给人以愉悦、娱乐的审美效果。小说的“游心寓目”,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也要“无尤”,毫无怨恨、不满之情,而得到应有的教育和熏陶。干宝的这一“游心寓目”说,确实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它提出了小说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效果。那么,怎样才能使读者得到这种“游心寓目”的审美效果,在志怪小说作者看来,这就需要“怪”、“异”、“奇”、“神”、“妖”、“仙”、“灵”、“幽”、“冥”等。从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的书名来看,无不带有这一类词语,如《神异经》、《洞冥记》、《列异传》、《神异记》、《异林》、《搜神记》、《神仙传》、《幽冥录》、《异苑》、《述异记》等。而志怪小说作者在创作中,特别有意识地记载非常怪异之事,以区别司空见惯的平凡琐事。如干宝在《进搜神记表》中明确表示:“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⑥又如萧绮的《拾遗记序》亦认为:“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

① 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45页。

② 张衡:《西京赋》,萧统《文选》卷2,《四部精要》(16)集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82上《方术列传》,第2703页。

④ 王瑶:《小说与方术》,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⑤ 干宝:《搜神记序》,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2页。

⑥ 干宝:《进搜神记表》,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3页。

广尚奇,宪章稽故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①干宝的“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和王嘉的“殊怪必举”、“爱广尚奇”,说明志怪小说的作者是自觉地搜奇寻怪,以此作为“小说”的素材。如果说志怪小说的“志怪”早期还有谶纬的深刻影响,将符瑞灾异同政治治乱得失联系起来的话,那么,随着志怪小说的发展,人们逐渐将“志怪”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因为它既迎合了人们猎奇搜怪的心理,又符合人们对“志怪”艺术的欣赏,因而能够起到“游心寓目”的审美效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此,干宝甚至提出原来典籍分为《七略》的^②,现在应该增至“八略”,而小说为其中之一。“游心寓目”说指出了小说独特的审美效果,也为小说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而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来看,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更具小说的因素,它标志着古代小说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也还处于“丛残小语”的雏形阶段,但是它比起当时其他类型的杂史杂传小说,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这是因为,志怪小说的“志怪”已经不能满足于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作者还必须运用想象来加以补充和发挥,于是逐渐有了较为完整的情节和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志怪小说的这一创作特点在各种条件作用之下,不断增长、扩大和完善,从而使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起着重要作用。如干宝的《搜神记》创作,其搜奇辑逸首先是来源于典籍记载和耳闻目睹。《搜神记序》曰:“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③干宝强调其撰述,既有先贤典籍记载可考证,也有亲自闻睹事实作为依据,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无失实”,是对事实的忠实记录,甚至以为“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④。然而事实上,干宝的《搜神记》在此基础上又“遂混虚实”,《晋书》干宝本传评论“博采异同,遂混虚实”^⑤。如果说干宝撰述《搜神记》胜览“群言百家”之书,又“访行事于故老”,这些都是“实”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干宝又进行了加工和重写,这就需要“虚”,即虚构、想象、幻想、夸张的艺术手法。如《搜神记》卷十一《三王墓》,本事早见于《列士传》、《吴越春秋》和《列异传》等,但都非常简略。而干宝的记载将原本事只有二百多字增加到五百多字,作者夸张手法和心理描写的运用,使故事的叙事层次分明、人物形象生动。从“收遗逸”的搜奇辑逸到“遂混虚实”的虚实结合,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谶纬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密切相关,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志怪小说都有谶纬的深刻影响。从谶纬的灾异祥瑞到志怪小说的搜奇寻怪,“志怪”逐渐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由此推动志怪小说的发展,并影响到我国古代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通讯地址:孙蓉蓉 南京 南京大学文学院 210093)

(责任编辑 晓 宁)

① 萧绮:《拾遗记序》,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第1页。

②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将古代典籍分为七大类,称之为《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按干宝“八略之旨”之说,应将“七略”增加小说略,而为“八略”。

③ 干宝:《搜神记序》,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2页。

④ 干宝:《搜神记序》,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2页。

⑤ 房玄龄:《晋书》卷82《干宝传》,第2150页。